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

MAOZEDONG YU
XINZHONGGUO JIANSHE

沙健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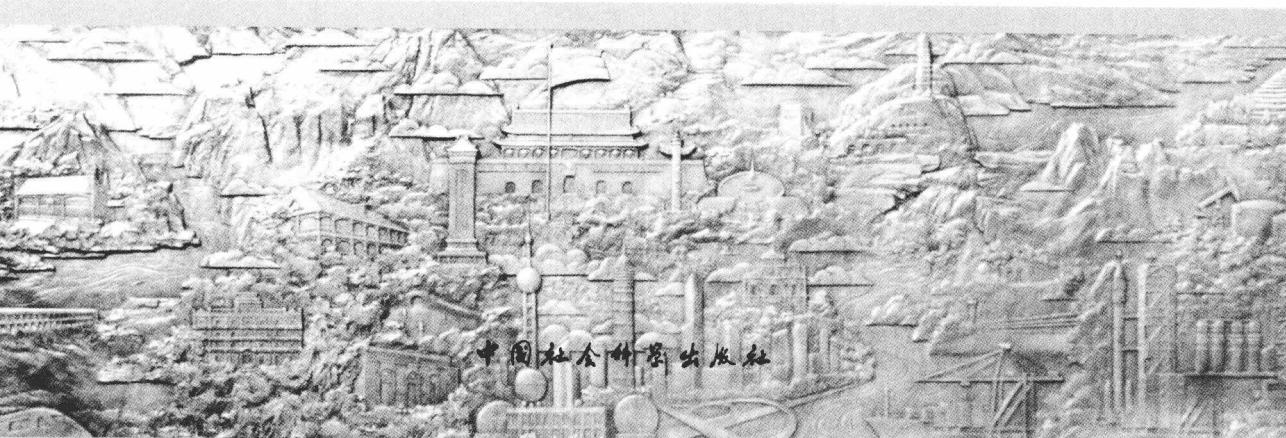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

MAOZEDONG YU
XINZHONGGUO JIANSHE

沙健孙/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 / 沙健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ISBN 978 - 7 - 5004 - 8268 - 0

I . ①毛… II . ①沙…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一生平
事迹②毛泽东思想—研究③中国—现代史—研究 IV. ①A752
②A84③K27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256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08 千字

定 价 5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任:	金冲及			
委员:	于沛	朱佳木	齐德学	李文海
	李捷	陈祖武	张启华	张星星
	张海鹏	何理	沙健孙	武力
	孟昭宇	赵剑英	梁柱	程中原
	董志凯			

前 言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同时也是为了检阅国史研究的成绩，促进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从长期从事国史研究的学者中遴选了一批作者，将他们的自选文集汇编成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予以出版。

本丛书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每本文集的书名由作者自拟，目录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或专题排列，书后附后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同志于 200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对如何正确看待和研究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阐述。这篇讲话与本论丛的编辑宗旨完全一致，经征得本人同意，作为总序放在每本文集的卷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编委会

2009 年 9 月 30 日

总序

正确认识新中国 60 年，为推动 国史研究作出新贡献^{*}

陈奎元

回眸新中国的 60 年，是光辉灿烂的 60 年，是令共产党人、全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 60 年。以 60 年为着眼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历史上各个兴旺的时期比，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各个大国开国以后的历程比，不仅是毫不逊色的，也是无与伦比的。在国际共产史上，18 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塌，苏联共产党在压力下自动解散、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国家解体，人民陷于困境，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自溃，形成历史的倒退，这是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惨痛曲折的一页。那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安然渡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时代的潮头，正像宋词中所描写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①，党中央坚如磐石，坚持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传统，走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里程。到今天，回顾 60 年的风风雨雨，应当相信和肯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奠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根基是牢固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成功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

* 这是陈奎元同志 2009 年 8 月 26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节选。

① (宋) 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载《唐宋名家词选》，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52 页。弄潮儿，《全宋词》作弄涛儿。



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就是显著的。假如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降下自己的旗帜，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卑躬屈膝，今天有谁会来研究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何以被人称作“金砖四国”之一？中国怎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13亿人会面向什么样的未来？

如何对待中共的历史，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严肃的科学事业，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研究国史要求政治思想性强，要讲政治、讲正气，要秉持古来史学家优良的道德操守。有关国史的著述一字千金，决不允许凭个人好恶臧否革命领袖和其他先烈。“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轻薄为文、信口雌黄，不但是对先人的不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捉弄。国史研究工作者应当善于明察，并且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

经历60个春秋，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选择也逐渐淡漠，有些人对国家取得的成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看到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也不知根源何在，看不清中国未来的前途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甚至发生某些误解，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听信那些告别革命的呓语，这种种疑惑就会使人们疏远并最终脱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统治下的凉州地方首领张骏不忘故国，他在向东晋皇帝的上疏中说：“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①这几句话用之于今天，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国史工作者应当弘扬前辈的志愿，启发人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不要日远日忘而是日久弥新。

^① 《资治通鉴》（卷95，晋纪17，成帝咸康元年）第7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04页。



★★★★★ 目录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

“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231)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若干战略性思考	(249)
毛泽东与“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的确定	(26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若干重要关系的思想	(281)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	(318)
毛泽东建党思想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349)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	(362)

■第四辑 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

毛泽东：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光荣旗帜	(383)
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	(398)
后记	(413)



第一辑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创建

为建立新中国绘制蓝图 和进行准备

一 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议事日程

进入 1949 年，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议事日程。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① 据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② 事实上，建立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时期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但是，要“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③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之中，这样的条件就逐步地具备了。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947 年 10 月 10 日，经毛泽东改定的解放军总部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在同年 12 月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未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只是“战争的时间还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87—1288 页。

③ 金冲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载《党的文献》1993 年第 6 期。



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他这样说，也是考虑了以下的情况的，即：“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①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又指出：政治方面，“孤立蒋介石是长期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他认为，“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会到来的”。^② 刘少奇在元旦干部团拜会上更乐观地预言：“今年再取得第二个决定性胜利，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可能倒台。”^③ 在公开的文告中，中共中央对全国胜利的时间，还是说得比较留有余地的。同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时，加写了以下的话：“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奋斗，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④ 由于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赢得巨大的胜利，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明确宣告：“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⑤ 在这之前，11月11日，他在给各中央局、各党委负责人的电文中已经作出上述估计，并要求“向干部会上宣布”。^⑥ 基于对形势发展的上述估计，1949年1月8日，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⑦

在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333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5页。

③ 《刘少奇年谱（1898—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⑦ 同上书，第234页。



党中央在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战略进攻乃至战略决战的同时，集中很大的精力，来从事建立新中国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着重解决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问题、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新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方针问题；第二，在组织上，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新中国的成立。这里主要讲一讲第一方面工作的情况。

二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8 年 9 月 8—1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是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绘制蓝图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权的性质及组织形式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作出了基本的答复。在 1947 年 12 月会议上，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且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及其领导地位的问题。

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如果我们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文件的前两章是毛泽东执笔的。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长时期内占据



优势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代替”。^①

在1948年9月会议上，毛泽东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证。这时，“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②他指出：“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据此，他认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③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他认为，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② 金冲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0、141页。



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① 在刘少奇作上述发言时，毛泽东插了一些话，意思是：在现阶段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有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②

毛泽东在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其他矛盾，如民族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认为，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也已经作过阐明。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所谓国体，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毛泽东在党的

^① 见《刘少奇年谱（1898—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②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4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中央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① 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即就其主体部分来说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因为“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人民民主专政从根本上是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相区别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②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的答复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③ 因为随着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各解放区逐步联结起来，统一问题也就很自然地被提出来了。

九月会议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国体政体问题。至于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究竟有哪几种，怎样对这些经济成分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那“还要考虑”。他建议先由刘少奇研究，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用。^④ 这表明，他希望这个问题能由七届二中全会来进一步加以解决。

同年9月15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该提纲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

^① 金冲及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一文中说：“‘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③ 同上书，第136页。

^④ 同上书，第146页。